

全球智库半月谈

习近平治下中美关系的可能未来

《21 世纪资本论》中的资本税

TPP 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角色——在亚太委员会的证词

德意志之难

去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非完全化的军事变革：评析中国军事力量的弱点

本期编译

蔡云飞

高歌

郭楚

郭子睿

黄杨荔

李想

李笑然

刘宁

刘天培

沈仲凯

唐靖茹

肖诗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刘天培	科研助理	沈仲凯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沈仲凯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习近平治下中美关系的可能未来 3

本文主要讲述了澳大利亚第 26 届总理 Mr. Rudd 分别在华盛顿特区、上海复旦大学以及查尔斯-诺伊豪泽尔关于中美关系可能未来的三次演讲，详细分析了中国视角和美国应对，以及美国视角和中国应对。最后，他认为为两国关系的长期未来构建的共同叙事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对现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克服的根本性分歧秉持现实性的理解；第二，对可能达成共同协议和建立共同机构的情况保持建设性的态度；第三，致力于逐步地建立战略互信，从而使中美关系迈向渐进性变革成为可能。

《21 世纪资本论》中的资本税 7

皮凯蒂认为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加收资本收入税是合理的。本文对这一论点提出挑战，认为皮凯蒂并没有考虑资本收益的风险因素。本文认为消费税也许是替代资本税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原油价格下跌会直接导致石油出口国汇率贬值吗？ 10

油价大幅下跌在资产市场引起震荡，并导致了卢布贬值。这篇专栏认为卢布下跌也许只是个特例——油价震荡对全球汇率结构影响有限，这是因为石油出口国倾向于通过外汇储备变动来减轻汇率压力。

全球治理

TPP 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角色——在亚太委员会的证词 13

本文是一篇在亚太委员会上的证词，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崛起以及其在外交上的强硬态度迫使美国急于推进 TPP 的签订，以重拾其在亚洲秩序中的统治地位。

作为对中国的回应，TPP 是必要的吗？ 18

Krugman 和 Cowen 对 TPP 是否必要以及中国的回应作出了讨论，对此本文进行了评论，认为应该更加着眼于实际，从 TPP 本身进行考虑，而不是单纯考虑与其他国家的竞争。

美国全球经济领导权危如累卵 20

随着决策大限临近，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重新授权在美国引起热议。本文指出，上述二者有助于增进美国在贸易中的领导权，错失这两大机遇将铸成一场大错。

经济政策

德意志之难 22

尽管从官方报告及国内社论来看，德国经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作者看来，事实决非如此。他指出，德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下降及老龄化；此外，财政紧缩、公共投资

过低也不利于其经济长期发展:前者会阻碍生产力提高和产业升级,后者则压抑了潜在增长。因此,结构转型、刺激投资势在必行,以弥补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

“印度梦”能快速实现吗? 24

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迅猛,并且在基建方面有所改善。基于本月初印度新一年的预算报告,作者看到其中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加强基建投资、削减企业税率等,都对印度未来经济增长颇有益处。作者指出,想要实现“印度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还需要在教育、卫生和经济政策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去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25

工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维持出口和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本文认同,工业在一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论证了不主要依赖于工业也可以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那些最为成功经济体都在各部门全面经历了知识积累、生产效率改善和投资增长的过程,刻意向制造业倾斜的政策应让位于促进经济体各部门前沿知识积累最大化的政策。

战略观察

中国非完全化的军事变革: 评析中国军事力量的弱点 29

中国军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变。关注中国军力的增长是重要的,但是关注中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弱点同样重要。通过对中国军队弱点的分析,我们能够准确的了解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的。这能够为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同时也可以限制中国运用军事行动解决纠纷的能力。

迈向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 31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复杂,一个构建良好的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将对应东亚甚至更大范围的地区问题带来积极作用。推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存在有政治、战略和技术等几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三国政府应切实加强领导力,为促进共同利益而打造持续有效的三边伙伴关系。

亚投行之祸: 华盛顿该如何应对 34

英国宣布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美国面临着受到盟友背叛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文章中就美国应对亚投行的措施提出了三种方案,并分别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美国加入亚投行或不再干预盟友加入亚投行才是明智的选择。

本期智库介绍 36

习近平治下中美关系的可能未来

Kevin Rudd /文 李笑然/编译

导读：本文主要讲述了澳大利亚第 26 届总理 Mr. Rudd 分别在华盛顿特区、上海复旦大学以及查尔斯-诺伊豪泽尔关于中美关系可能未来的三次演讲，详细分析了中国视角和美国应对，以及美国视角和中国应对。最后，他认为两国关系的长期未来构建的共同叙事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对现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克服的根本性分歧秉持现实性的理解；第二，对可能达成共同协议和建立共同机构的情况保持建设性的态度；第三，致力于逐步地建立战略互信，从而使中美关系迈向渐进性变革成为可能。编译如下：

本文主要讲述了澳大利亚第 26 届总理 Mr. Rudd 分别在华盛顿特区、上海复旦大学以及查尔斯-诺伊豪泽尔关于中美关系可能未来的三次演讲，详细分析了中国视角和美国应对，以及美国视角和中国应对。

1、中国视角和美国应对

本部分是 Mr. Rudd 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兹比格夫·布热津斯基学会成立仪式上的演讲。

Mr. Rudd 认为未来全球范围内战略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中美关系的未来。这并非仅仅因为美中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且因为未来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与经济格局，以及在更广阔范围的世界秩序，都将由中美关系未来的变数所决定，而这也将从根本上持续地影响其他重要的全球事务。在本次演讲中，他主要讲述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中国持续发展与崛起，那么如何判断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自我定位的长期意图？

第二、在中美实力相对变化，区域及全球秩序逐渐调整的过程当中，中美如何理性设计战略，容纳彼此利益诉求，以避免冲突，保持和平？

第三、为达成上述目标，习近平主席所提的“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中国的意图

Mr. Rudd 认为中国意图的形成取决于诸多因素，而非仅仅是与美国国家意图和国家行为的博弈。他认为，中国世界观与国家意图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如下五个方面：

- 中国的国家价值；
- 中国的历史经历；
- 中国对于区域及世界的主观判断；
- 中国的“客观”国家利益；

- 中国对于美国愈发加深的战略不信任。

(2) 关于美国政策回应的初略想法

Mr. Rudd认为中美双方领导人共同构建未来中美关系的宏大叙事，并在其中留足分歧的空间，是大有裨益的。他提倡中美共同构建一个包含全面指导框架、具体分歧管控、以及长远积极发展的宏大叙事。可以称其为“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或者说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构建一个中美共同的未来。

第一、现实主义的部分

中美双方对于当下国际关系的理解都基于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背景框架下，如果缺乏共同价值或共同利益，可能无法产生任何解决方案，譬如东亚的领土争端。这些争端很难解决，只能认可分歧，管控危机，以免全面破坏现有的关系。

第二，建设性的部分。

无论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只要在中美有价值相通或利益重合的地方，就可以由中美共同构建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

第三，未来的部分。

中美共同建设区域及全球公共产品可以促进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逐渐形成；而由这些公共产品构建成功所带来的政治和外交资源也可以逐渐弱化原先现实主义视角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并最终将其解决。如此中美关系的构建须基于长远的愿景，而非短期的功利。

(3) 新型大国关系

邓小平以中国国内改革为背景，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国际化和中美关系构建的未来，也极具参考意义。以此为导向，我们可以逐步消弭中美之间理解与价值的鸿沟。这需要对彼此价值，认知和利益的现实理解。这需要平等的富有创造力的外交想象力，来绘制中美可以共同建设的宏伟蓝图。这也需要政治意志和决心来梦想和开创一个有别于可惧的历史轨迹的新的共同未来。或许这也是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初心本愿。

2、美国视角和中国应对

本部分是 Mr. Rudd 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演讲。

在上篇演讲中，他提到中国国家意图的存在并不等同于这些意图是精确无误的。重要的是，这些意图是存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意图影响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这与他今天在上海的演讲是一致的。他阐述了一系列与中国崛起相关的美国战略意图。需要重申的是，这并不代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战略意图是存在的，同样地，他们也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制定。随着中国的强盛，

这些不同与分歧会与日俱增。智慧的外交始于理解彼此的意图和其背后的原因。这对中国是如此，对美国亦然。

（1）美国的价值

中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本土价值；而美国所强调的普世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的信仰相悖。不去理解自由主义民主价值中的机遇、自由与民主在美国政治传统中长久的核心地位的话，也就无法理解美国对中国、区域，以及世界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在美利坚合众国初创之时就被视作全人类的，而非美国独有的，共同价值。

此外，中国的儒家理念并不具有向世界输出价值的特性。而美国的自由民主无论是主动传道他国，抑或被动展示自我，实际上是极具输出性的。

（2）美国的中国经历

中国在美国过去 150 年的经验中的转变呈现出了这样一个脉络：从一个传教士眼中的传教沃土，到美国败给共产主义的典型国家，从曾经对抗苏联的同伴，到今天成为在世界秩序的诸多层面挑战美国单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方面冲击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崛起力量。

（3）美国对世界的理解

实际上，在美国对中国认知的核心，其对中国在过去 35 年间所取得的成绩是高度赞赏的。在美国人看来，尽管在中国入世的十年谈判里显得困难重重，但美国没有意图阻碍中国入世。相反地，美国为中国入世竭尽全力给予帮助。美国也可以选择不创建二十国峰会来吸纳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事务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美国还是没有这样做。但，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对于美国全面欢迎（而非阻隔）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与承认。

当前，在美国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宣称的“和平崛起”只是暂时的，用来说服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必担心中国现在的发展。由此看法所演化出的认定现实将是：当中国实现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之后，会寻求与美国达到权力均衡甚至超越美国；那么，到了那时，中国会迅速把美国赶出亚洲，以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继而撼动现行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基础。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上述看法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回应：无论是从中国在历史上的角色，或是出于中国长期专注国内事务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政策上所反映出构建多极世界而非建立霸权主义的中国希望。尽管如此，如何智性处理正在持续升温的美国对于中国长远意图的猜疑与揣测，将会成为两国构建关于地区和全球未来共同宏大叙事的重要考量。

3、查尔斯·诺伊豪泽尔演讲

本部分是Mr. Rudd于2014年10月15日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演讲。他的判断主要如下：

首先，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分歧在于政治价值的不同，这一鸿沟暂时难以消弭；其次，两国政治精英对对方的战略认知日益消极；第三，现阶段两个政治体系的共同利益不足以建立足够的战略稳定因素以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关系内在的竞争性和冲突性；第四，这一关系的内在变数可能会引发日益增强的战略漂移，而如是趋势只有在两国领导人有意识地，审慎地开始为彼此共同的未来构建共同叙事的前提下才可能得到抑制。

最后，为两国关系的长期未来构建的共同叙事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对现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克服的根本性分歧秉持现实性的理解；第二，对可能达成共同协议和建立共同机构的情况保持建设性的态度；第三，致力于逐步地建立战略互信，从而使中美关系迈向渐进性变革成为可能。

本文原题为“China under Xi Jinping: Alternative Futures for U.S.-China Relations”。本文作者Kevin Rudd为澳大利亚第26届总理，并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本文于2015年3月刊于CSIS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21 世纪资本论》中的资本税

Alan J Auerbach 和 Kevin Hassett /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皮凯蒂认为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所以加收资本收入税是合理的。本文对这一论点提出挑战，认为皮凯蒂并没有考虑资本收益的风险因素。本文认为消费税也许是替代资本税的一个更好的选择。编译如下：

皮凯蒂的著作《21 世纪资本论》中，有三个核心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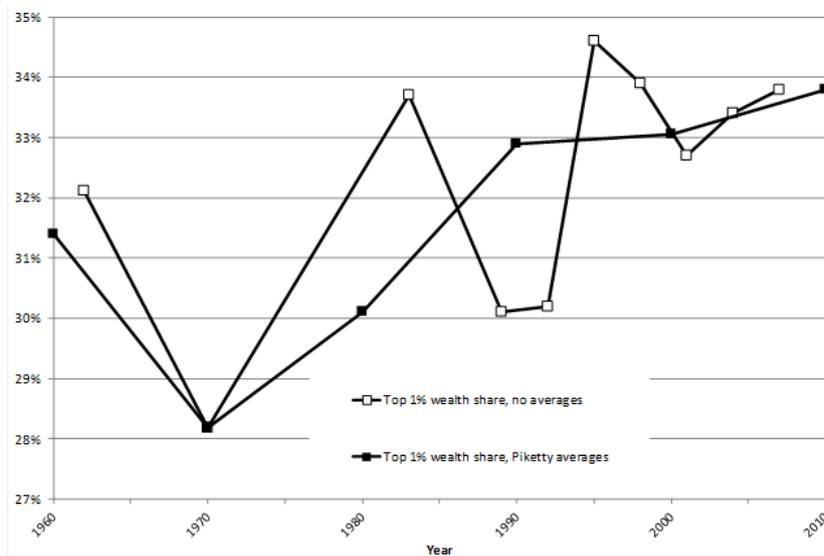
- 财富不可避免地将积聚于少数人手中；
- $r > g$ 使得资本逐渐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
- 资本税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本文将通过检验数据、使用更全面的分析方案来驳斥这三点。

1、检验数据

结合已有的一些反对观点，下面采用近年来美国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如图 1 所示，在使用其他来源的美国财富数据时，皮凯蒂夸大了近期数据上升的幅度并且省略了期末数据中的一段下降趋势。

图 1 前 1% 富人的财富份额



2、资本收益率 (r) 与经济增长率 (g) 对比

在原书中，资本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推理是这样的：首先， $r > g$ ；其次，储存资本的收益使得财富比经济总量增长得更加迅速；最后，资本收益率很难降低，最终结果就是财富越来越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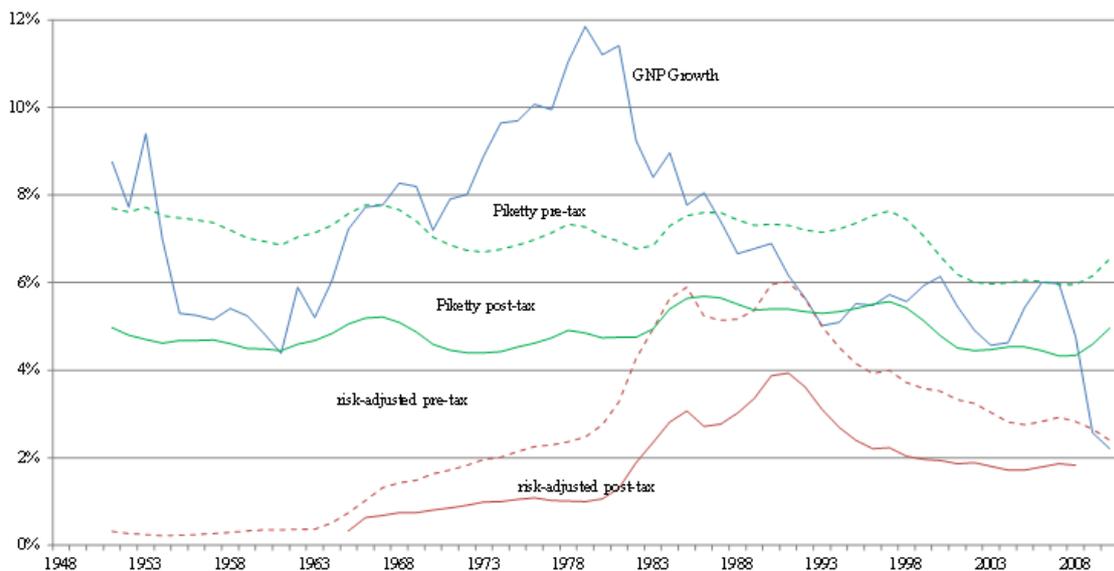
但是,如何确定 r 的准确数值?扣掉风险和税,所有资产的收益率应该相等。因为存在市场风险和人们对于风险的规避,资本回报率存在溢价。自然地,市场投资要比安全投资收益更高。但是在资源极为稀缺的地区,市场表现反而会不如安全投资。因此,不考虑资源稀缺的情况来计算资本收益率有些欠妥。更何况,好的情景和坏的情景不能一概而论。另外,皮凯蒂应该使用扣除税率之后的资本收益率。

因此,皮凯蒂的分析有两个问题:

- Piketty 和 Zucman (2014) 使用的资本收益税率为平均税率。但是 Piketty 书中着重强调的是财富排名前 1% 甚至 0.1% 的人, 使用平均税率不妥。
- 皮凯蒂使用的是国民会计核算的数据, 没有包含风险。

我们的论文改善了这两点。其结论和皮凯蒂的结果都放入图 2 中:

图 2 四种不同算法后得出的 r



很明显,调整过后的 r 显著地低于皮凯蒂的计算结果,同时也低于经济增长率。这表明“ $r > g$ ”的结论很可能不成立。

3、全球资本税及其替代方案

皮凯蒂书中提出的征税方案比较激进,与目前全球减税的趋势并不相符。尽管如此,他的方案仍然启发了我们。

近年来税收方面的文献让学界更好地理解不同基本税种之间的规律,这些税种包括资本税、消费税和劳工收入税等。尽管经济模型认为劳工税和消费税可以等同,但它们之间的重要差距之一在于消费税可以大力打击现有的财富来源:

租金、遗产、隐蔽的劳工收入等。范围更大的消费税可以让个体在一生的时间内更加优化税收负担，且使用消费税替代资本税不会损害投资意图。另一方面，资本税由于不考虑真实的资本收益，会扭曲真正的投资意图。所以资本税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另外，一些特定的支出如果能够以消费的形式征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治问题。例如将资本家捐助竞选列入消费税征收的范围。

本文原题为“Capital tax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本文作者 Alan J Auerbach 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与法学教授，Kevin Hassett 为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会与经济政策研究会主任。本文于 2015 年 3 月 15 日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原油价格下跌会直接导致石油出口国汇率贬值吗？

Sascha Bützer, Maurizio Michael Habib 和 Livio Stracca/文 蔡云飞/编译

导读：油价大幅下跌在资产市场引起震荡，并导致了卢布贬值。这篇专栏认为卢布下跌也许只是个特例——油价震荡对全球汇率结构影响有限，这是因为石油出口国倾向于通过外汇储备变动来减轻汇率压力。编译如下：

近几个月石油价格暴跌，同时，俄罗斯卢布和阿塞拜疆本币应声下跌，这似乎印证了汇率和油价之间的关联。然而油价大幅波动真的和全球汇率结构变化有普遍性的联系吗？

1、理论与实际

理论上来说，油价震荡可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汇率（Bodenstein et al. 2012）：贸易条件（the terms of trade）变化和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s）。因此油价下跌会使出口国货币贬值。

然而在现实中可能有抵消力量。首先，货币当局也许不喜欢名义汇率大幅波动，他们会通过增减外汇储备来减轻油价波动带来的汇率压力。其次，国际风险分担渠道也许提供了自动稳定机制。考虑到石油出口国已经有大量富余的外汇储备，油价下跌带来的本币贬值会使其资产升值，因此这会带来稳定效应。换句话说，汇率不会因为油价波动而下跌得太厉害。

2、证据

我们对石油震荡与汇率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个详尽的实证分析。我们使用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以 1986 年到 2013 年为样本区间，覆盖了 43 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我们使用 VAR 模型，同时区分了由三种不同原因导致的石油价格震荡：全球性需求、石油相关需求和石油供给。

文章发现了三个事实：

- 就这些国家的样本总体而言，我们没有发现能证明油价震荡后石油或商品贸易平衡和实际汇率变化之间显著相关的系统性证据。
- 然而，石油出口国倾向于通过减少外汇储备来抵消贬值压力，这在石油需求冲击后比较明显，但在全球性需求冲击后也会有这个现象。
- 汇率制度会影响结果。采用浮动汇率的石油出口国不仅在遭受石油需求下降冲击时会减少外汇储备，而且会经历名义汇率下跌。对这些国家来说，石油需求冲击和汇率就是相关的了。

总之，我们发现石油冲击，尤其是石油需求冲击，确实使石油出口国受到汇率市场压力，而这在浮动汇率国家更为明显，并且这些国家会以增减外汇储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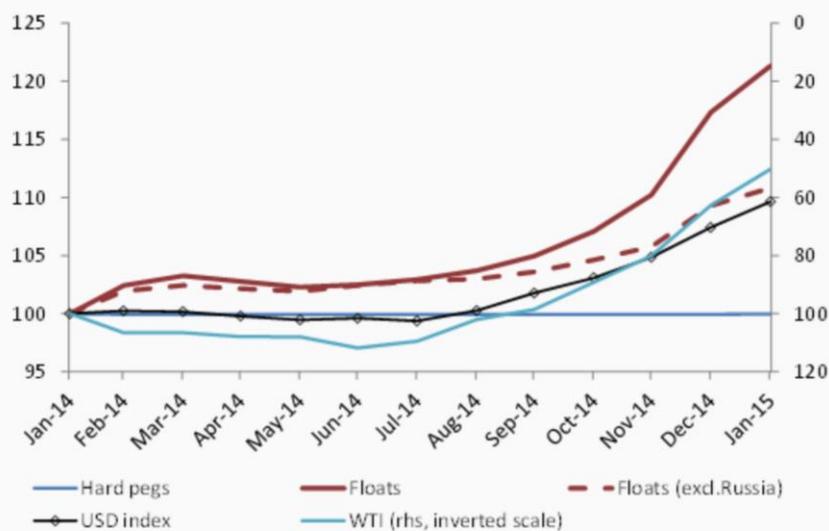
方式来抵消汇率压力。然而，更普遍而言，我们发现油价变动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很微弱，这也许是另一个汇率脱离现象。

就其幅度和不可预料性而言，2014年6月到2015年1月间油价的下跌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准自然实验”，我们不禁要问汇率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石油出口国家货币相对美元确实有所贬值，但由于同期美元的强势，大多数其他货币也相对贬值。如果我们考虑到俄罗斯的特殊情况而排除掉卢布，我们会发现，石油出口国货币并没有显著地贬值。

表1 浮动汇率货币对美元贬值，基本与其他货币一致

Figure 1. Floating oil currencies depreciating against the US dollar, roughly in line with other currencies

Exchange rate vs. USD of oil exporters and trade weighted value of the USD (index Jan-2014=100)



Source: Haver and authors' calcul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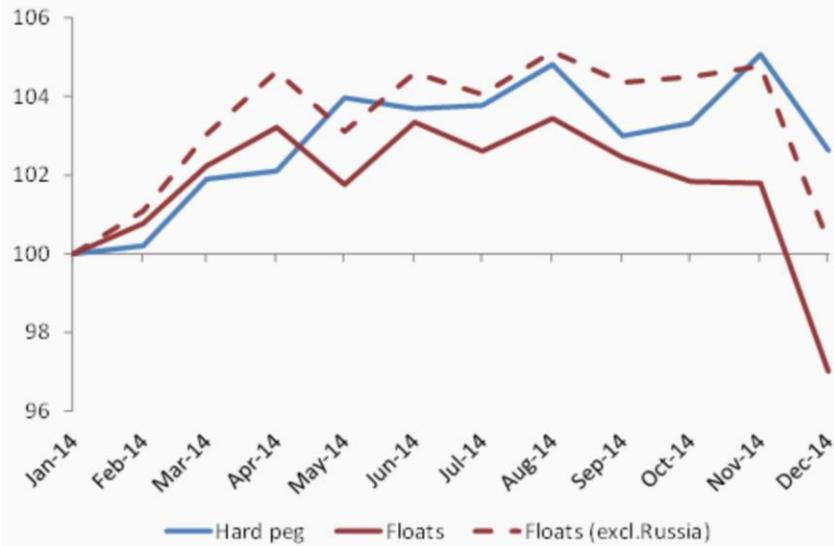
Notes: Hard pegs: Oman, Qatar, Saudi Arabia, UAE, and Venezuela. Floats: Azerbaijan, Kazakhstan, Mexico, Nigeria, Norway, Kuwait, and Russia. The USD index is the nominal broad trade-weighted index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WTI is the spot price of oil, USD per barrel, from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石油出口国的表现与我们的预测一致，为了稳定汇率它们减持了外汇储备（见表2）。同时，有意思的是，固定汇率国家和被视为采用浮动汇率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行动一致。

表 2 石油出口国减持外汇储备

Figure 2. Oil exporters running down international reserves to counter the negative oil shock

International reserves of major oil exporters (index Jan-2014=100)



Source: National authorities/Haver and authors' calculations.\

Notes: Hard pegs: Oman, Qatar, Saudi Arabia, UAE, and Venezuela. Floats: Azerbaijan, Kazakhstan, Mexico, Nigeria, Norway, Kuwait, and Russia.

本文原题为“Plummeting oil prices, depreciating oil currencies? Not so simple”。本文作者 Sascha Bützer 为德意志联邦银行国际货币事务部经济学家, Maurizio Michael Habib 为欧洲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Livio Stracca 欧洲央行国际政策分析部主任。本文于 2015 年 3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TPP 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角色——在亚太委员会的证词

Claude Barfield/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是一篇在亚太委员会上的证词，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的崛起以及其在外交上的强硬态度迫使美国急于推进 TPP 的签订，以重拾其在亚洲秩序中的统治地位。编译如下：

“美国的贸易政策一直都不止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贸易与其他大多数国际关系都息息相关，因此，贸易政策即是国家安全政策”。

托马斯·谢林，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处于其外交与安全战略和经济发展目标的交叉口上。一份贸易协定的签订，不仅影响国家的战略利益，而且关乎国内企业和员工的命运。虽然不一定相矛盾，但安全和经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支持者和利益集团亦截然不同。除了在世界贸易组织这种专门处理贸易问题的多边谈判之外，双边、次区域、和区域贸易谈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战略的影响。例如，美国的总统行政办公室要权衡来自不同公共机构和私人利益集团的利益，如美国各州、国防、商业、劳工部，美国环境保护署，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组织、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等等，充分考虑经济和政治利益之后，最终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政治学家们也常常把贸易决策比作双层博弈：国家领导人努力在美国内部关于贸易谈判目标达成一个共识，然后试图在国际上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妥协，迫使国家领导人回到国内层面进行谈判。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与哥伦比亚和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1、美国的贸易/安全策略

从 1945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大体上坚持一种双轨的贸易政策：一是多边主义，如加入 GATT（关贸总协定）；二是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因为关贸总协定规则并不包括重要的贸易部门和贸易问题。因此，国内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求美国决策者与主要的合作伙伴如欧共体和日本进行双边谈判，从而完成在双边谈判中没有实现的贸易政策目标。

在冷战结束，欧共体和日本的区域经济开始崛起后，当时的布什政府便开始反思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并重新定位贸易和安全政策。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是当时主要的推动者。贝克指出，尽管美国的贸易谈判仍以关贸总协定（GATT）为主，“双边和小范围可能更有助于推动世界开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标志着美国的转变。在亚洲，贝克积极响应澳大利亚和日本关于创

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提议，同时反对马来西亚总统在建立东亚经济论坛时把美国排除在外。

贝克反对任何将美国与太平洋另一端的亚洲国家分开来的计划，他声明美国的霸权在亚洲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挑战，这既是外交和安全的声明，又是国家经济利益的声明。从那时起，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和外交/安全目标便密不可分。

克林顿政府有幸经历了战后所谓的“单极时期”。冷战结束后，在亚洲，日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还仅仅略高于大范围平均水平。本着经济目标优先的原则，美国领导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升级和贸易目标的建立，即发达国家在 2010 年之前、发展中国家在 2020 年之前实现贸易自由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都表明，克林顿政府认为强大的政治目标可以支持经济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支持可行的民主制度。

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公开将政治和安全目标与贸易政策联系起来。詹姆斯·贝克的得意门生佐利克(Zoellick)，曾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时就职于美国贸易代表署，他在演讲和国会听证会上都明确表示支持这种观点。在布什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签订了 17 份双边或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其中一些 FTA 主要是经济目的(如智利，秘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 CAFTA 等)，还有一些显然为了政治和外交目的(如巴林、阿曼、摩洛哥，以及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而与韩国、哥伦比亚、巴拿马签订的 FTA 则兼具经济和安全目标，不过在布什总统任期结束之前未获国会批准。

2、奥巴马政府和“重返亚洲”

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很多对外政策上不同于布什政府，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外交和安全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奥巴马政府将重大战略和政治贸易决定的任务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不是美国贸易代表署。

• 亚洲：贸易和经济政策

当奥巴马刚刚执政时，他似乎不太可能推进美国贸易议程。众所周知，他在竞选活动中夸口说，他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其他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因此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不会有贸易政策。但在 2009 年底，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挑战推动贸易问题重返议桌。

虽然在 2009 年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并且受到民主党国会的反对，奥巴马仍然转向贸易出口来提振低迷的美国经济。尤其面向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按照计划，奥巴马承诺在一个五年期内将美国出口额翻一番。

- **重返亚洲**

虽然经济是重要的诱因，但使奥巴马政府做出这种决定更重要原因是亚洲快速变化的外交和安全状况。2009 年，在其就职后的几个月内，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朝鲜率先进行核试验，威胁美国盟友韩国的安全，并发射两枚短程导弹。美国立即宣布要完成已经陷入僵局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KOPUS）。

扩大范围来看，甚至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国大陆在外交上表现强硬，就已经与东亚邻国产生了分歧和冲突。中国大陆虽然不曾否认其“和平崛起”的口号，但在处理他国关系包括东盟时表现的更加自信。在北京出版的地图里，中国的南部包含了 9 条 U 型的虚线，中国宣称拥有该海域的 80% 以上。随后，中国多次与邻国就这一自称的边界发生冲突，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此外，中国还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就日本和中国东部海域问题发生了争执。

- **美国的回应**

国务卿克林顿的第一次出国旅行选择了亚洲，而不是传统上的欧洲，表达了“美国要重回亚洲”的意愿，立誓要追求“更严格的承诺和约定”。在几个月内，美国与东盟签署了友好商务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自 2009 年以来，克林顿拜访了九次亚洲，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多。

- **奥巴马的亚洲之行**

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 9 天的亚洲之行更能体现美国对亚洲的重视。在夏威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奥巴马继续做出重大声明，改进对印尼政策并会见东盟领导人，成为第一位参加东亚峰会的美国总统。

从第一站夏威夷开始，TPP 便成为舆论的焦点。虽未成熟，但 TPP 的框架已成型并成为美国外交的象征，但这种象征带有很高的风险。TPP 谈判将致力于解决最棘手的经济和政治谈判问题。但无论将来结果如何（见下文），这些谈判的成功或失败都将成为检验美国领导力和亚洲这个长期影响成功或失败的核心标志。

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这份跨太平洋的协议被誉为 21 世纪贸易协定的新模式。它的目标是超越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模式，编写新的规则。因此，TPP 具有重要的地缘经济影响：如果成功，它将成为未来全球自由贸易协议甚至是世贸组织跨国谈判的模板。

21 世纪争论最多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新规则、劳工和环境、知识产权限制、监管改革、政府采购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供应链管理、中小企业贸易促进等等。在监管改革上，首要的目标是减少(或至少相互承认)监管壁垒，这种壁垒严重影响着国际贸易。谈判会议中讨论的提案包括透明的程序性规则，消除重复或重叠的规定，限制反竞争行为，在服务、健康和安全措施方面彼此认证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往往涉及到传统的“20 世纪”争论的焦点，如在纺织品、服装、鞋子、糖、奶制品和棉花等产业仍然存在的关税和贸易壁垒。

4、战略影响

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力量下，美国领导下的自由贸易体系和亚太区域秩序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地缘经济的竞争**

与 TPP 相竞争的是由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它可以成为亚洲的另一个选择。它于 2013 年开始，由东盟+ 6 国组成，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包括一些 TPP 成员，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

在实际的谈判模式上，TPP 和 RCEP 对比鲜明。首先，在 TPP 中各个东盟国家单独谈判，而在 RCEP 里东盟代表一个单独经济和政治体。因此，RCEP 从一开始就既包括东盟欠发达的国家(老挝、柬埔寨、缅甸)又包括更发达的成员如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这将产生很大不同。首先，在谈判模式上将会有很大的灵活性。此外，RCEP 还将为欠发达的东盟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异性的待遇。最后，与 TPP 相比，RCEP 成员国是固定的，仅限于目前的 16 个成员国，而 TPP 从加入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从最初的 5 个增加到现在的 12 个成员。

实际上，与 TPP 的宏伟的整合目标相比，RCEP 最初的目的并没有那么雄心勃勃。他们分别就商品、服务和投资成立了三个谈判小组，但协议并不会包含很多关于“幕后”的关税壁垒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会在 TPP 谈判中涉及。RCEP 成员国承诺到 2015 年底将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尽管多数人认为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然而，即使短期内没有什么实质性进步，RCEP 作为亚洲内部的替代选择，仍有可能导致 TPP 的某些谈判受挫或失败。

- **战略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 TPP 谈判在不断深入(无论成功与否)，东亚的战略与安全形势却变得更加复杂。此外，有些盟友和贸易伴越来越担心美国在东亚的坚定和毅力。这些担忧源于不同的来源。尽管美国誓言要向亚太地区“调整”安全部队力量，到 2020 年将在太平洋投入 60% 的海军资产。但亚洲的领导人完全认识到，这只是美国国防预算下降 60%。他们也意识到政治僵局往往会导致国内政策制定的停顿不前。

除了这个现实之外，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如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的干扰，以及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来对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说明我们在全球的责任可以覆盖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在最近的东亚，中国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也日渐凸显。不顾它的政治形象和与其经常宣称的“和平崛起”相矛盾，北京已经挑起或加剧了与东亚邻国的争端。这些争端都集中在有争议的海上边界和管辖权上，包括与日本关于中国东部海域钓鱼岛的争端，与越南在南海的西沙群岛的争端，与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在南沙群岛的争端，与菲律宾在黄岩岛的争端。最近几个月，中国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建立了石油平台。在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拒绝停止开发有争议的海上领土，或认真地进行谈判，或是以某种形式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地区。

最后，中国在东海的宣布防空识别区，中国不仅直接向亚洲邻国下战书，而且直接挑战美国和长期遵守的国防公海自由原则。美国已经拒绝承认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并在航班飞过争议区域时拒绝通知北京。

以上简短的外交和安全纲要是为了强调，TPP 作为美国对“重返亚洲”的最核心和最具体的象征，贸易协定如果未能成功，其影响将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

新加坡领导人，深谙美国的领导和 TPP 在东亚秩序上的作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几周前警告了 TPP 失败的后果。他说：“三年以来，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来履行我们的诺言...”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和亚洲必须有一个经济和军事的联合：“如果你不完成 TPP 那就是输（给中国）...如果你不促进贸易那么还促进什么？当你说自己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意味着什么？”

奥巴马总统明白这一点，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说：“中国想要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为什么会放任这种情况发生？规则应该由我们制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授予我贸易推动的权力来保护美国工人，从亚洲到欧洲签订强大的贸易协定，自由且公平。”

本文原题为“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merica’s strategic role in Asia”。本文作者 Claude Barfield 为企业研究院驻院学者。本文于 2015 年 3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作为对中国的回应，TPP 是必要的吗？

Simon Lester /文 唐靖茹/编译

导读：Krugman 和 Cowen 对 TPP 是否必要以及中国的回应作出了讨论，对此本文进行了评论，认为应该更加着眼于实际，从 TPP 本身进行考虑，而不是单纯考虑与其他国家的竞争。编译如下：

Paul Krugman 近日发表了一篇关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博文。总体而言，他对 TPP 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他引用了 Larry Summers 近期的专栏文章，提到 Summers 应该是支持“本可以理想化的 TPP”，但是反对“TPP 目前实际当中几乎成型的方案”。Krugman 也深有同感。

Tyler Cowen 对此回应如下：

我非常同意他博文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观点，虽然我的表达方式和措辞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 Krugman 反对 TPP 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论述中未出现“中国”。他的文章以问题结尾：“到底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要在这件事上消耗那么多政治资本，例如疏远劳动者，打击改革论者？”答案其实很明显：这件事要么依美国条款产生，要么就变成中国条款而我们被排除在外。为了明显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前者，奥巴马总统站在实用主义者的角度，非常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Cowen 是我最喜欢的博主之一，他的风格和主旨都甚合我意，但这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他所说的中国主导指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有 16 国参与谈判，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这和 TPP 在参与国上有一些重合，RCEP 中有 12 国是 TPP 成员。我认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二：其一，如果没有 TPP，则会有 RCEP，并会对美国不利；其二，RCEP 会反映中国意志，而不是美国的，这对美国不利。

简单来评价一下这两点。首先，RCEP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 TPP 的回应。如果 TPP 失败，RCEP 的积极性可能也会被削弱。并且，即使不考虑 TPP 的走向，达成 RCEP 也并非易事。让印度、中国和其他 14 个国家达成一致并不容易，所以 RCEP 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

第二，“中国条款”这个词让人感觉仿佛这种协定会把国有企业常态化。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相关问题，我无法确定这种协定跟其他贸易协定有什么区别，除了可能对劳动权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像美国协定那么重视。当然，关税降低，服务自由化，还有一些惯常的议题也都包含在内。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 TPP 自身的特点和价值，而不是担心其他国家会怎么做。如果他们想要在他们之间实现自由化那也很好，这不应被视作威胁，只是一种激励我们在贸易谈判方面做得更好的动力。

本文原题为“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本文作者 Simon Lester 是 CATO 的 Herbert A. Stiefel 中心贸易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3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全球经济领导权危如累卵

Caroline Freund/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随着决策大限临近，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及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重新授权在美国引起热议。本文指出，上述二者有助于增进美国在贸易中的领导权，错失这两大机遇将铸成一场大错。编译如下：

眼下，两场贸易战争正在华盛顿肆虐：一场围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展开，另一场则是对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的重新授权。TPP 是美国与 11 个亚洲及拉丁美洲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协定。美国进出口银行是美国的出口信贷机构，为美国的出口商提供融资支持。贸易支持者认为，TPP 与美国进出口银行都促进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权，有助于确保美国处于最佳处境。

随着决策大限逼近，关于二者的争论正持续升温。尽管奥巴马政府和贸易伙伴们希望于今年春季达成协议，然而，他们不得不等待来自美国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TPA）。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章程将于 2015 年 6 月底到期，但白宫领导人拒绝将其提交投票表决。

自 2000 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美国需要 TPP 和强有力的出口信贷机构以支持其产品保有国际竞争力。2013 年，全球贸易总额高达 18.5 万亿美元，几近 2000 年的三倍。这一显著的增长主要受新兴市场驱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商品贸易额占比自 2000 年的 25% 升至 2013 年的 42%。2000 年初，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其后为德国、日本，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中国位列前十。而在 2013 年，中国成了第一大出口国，俄罗斯也挺进前十。

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协助美国企业参与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TPP 能降低美国在外国市场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使美国企业更好地进入智利、越南等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中制定规则，如在全球贸易规则中引入劳工和环境标准、确立专利保护法和投资者权利，将为美国及其 TPP 伙伴在全球贸易政策中带来先发优势。此举也有助于撬开服务业市场，美国在该出口领域仍位居世界第一，增速也比商品贸易要快。TPP 能为货物及服务业开拓广阔的市场，平衡全球贸易中部分新锐领导者的利益，因为后者可能偏好不同于 TPP 的规则。

新兴市场不仅是增长最快的出口商，也是增长最快的进口商，其进出口份额都在上升，目前约占全球进口额的 40%，而在 2000 年仅占 23%。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印度位列第十，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泰国都在前 20 之列。美国出口商若要在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上寻找商机，就必须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生产者竞争。

这便是美国进出口银行出现的原因：与这些外国市场的进口商协作需要专业的技能，而许多私人银行都不具备这些技能。美国企业还要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商竞争，他们的背后是勇猛进取的出口信贷机构。如果没有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的出口商们将明显处于劣势，输给那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令人烦恼的是，国会中极左派和极右派的代表已经联合起来反对这两项协议了。来自极右派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政府介入的适当程度，该派成员希望美国进出口银行关门，因为它只是政府乌纱帽上的一根翎毛；他们也反对 TPP，因为当局需完成 TPA，给执行者授予“过分的权力”。极左派为进出口银行对美国某些大企业的融资支持而担心，并认为 TPP 将伤害进口竞争产业的美国工人。

事实上，这场战争着眼于更重要的事：国家的未来。全球化正在进行，领导比旁观要好得多。TPP 和进出口银行的重新授权有助于增进美国在贸易中的领导权，如果美国人选出的领导者未能抓住这两大机遇，将会铸成大错。

本文原题为“[Ou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Is at Stake](#)”。本文作者为 PIIE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12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德意志之难

Angel Ubide/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尽管从官方报告及国内社论来看，德国经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作者看来，事实决非如此。他指出，德国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下降及老龄化；此外，财政紧缩、公共投资过低也不利于其经济长期发展：前者会阻碍生产力提高和产业升级，后者则压抑了潜在增长。因此，结构转型、刺激投资势在必行，以弥补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编译如下：

1、人口问题

当下，德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衰退：按未来 50 年下降 20% 的预测计算，将从目前约 8100 万人口下降至 2060 年的 6500-7000 万人口——这一数字甚至低于法国人口。不仅如此，在人口结构上，德国还面临的老龄化：其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目前约为 20%，到 2060 年则将上升至 35%。显然，劳动适龄人口将相对下降，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

然而，当下的状态却是处于一个政治“蜜月期”，因为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选民更关注于其养老补贴，比之年轻人更有倾向去投票。不过对于德国的年轻一代，乃至欧洲，甚至整个世界，这显然不是一个最优状态。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人口与生产率增长两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人口问题，德国可以降低移民门槛，同时提高劳动参与率（尽管就业或许比较紧张，但毕竟延长退休年龄显然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德国的生产率增长空间巨大——近些年来德国经济有所衰退：其每小时的 GDP 平均增长率从 1995-2005 年的 1.6%，于 2012、2014 年分别下降至 1.6% 和 0。而从整体上来看，去年德国 GDP 增长率完全来自于就业增长的贡献；而就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大量不稳定、低收入、低效率的岗位，这则进而会加剧不平等程度。

2、财政紧缩

尽管适应于政治“蜜月期”，但德国与其专注于财政紧缩，不如想办法提高生产率。而这则需要鼓励结构转型及生产性投资，包括：放开服务业，尤其是贸易及专业服务；储蓄银行的合理化和自由化，即放开对金融投资的限制并使自身脱离政治干预；对能源政策进行再评估（过于注重可再生能源）。这一系列的改革可以刺激潜在增长率和消费，进而提高国内私人投资。

3、公共投资

德国当局虽然否认它存在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但数据毕竟不会说谎。德国的公共投资占 GDP 比重在 OECD 国家中位于倒数第二，而考虑资本折旧，其净公共投资自 2003 年起都是负值——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减少。不妨再从一个简单的侧面来看，根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信息，德国 40% 的桥梁处于危险状态。

此外，由于利率过低——六年期的德国债券，其利率为负值，而十年期的利率仅为 0.35%。显然，对于当下的经济环境，审慎策略不是储蓄，而是投资；通过刺激对高产出领域的公共投资，德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得到提高，弥补人口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 IMF 的分析，一项每年占 GDP 比重 0.5% 的公共投资，只要持续四年，将对 GDP 产生 0.75% 的永久性提升，进而对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产生正反馈。

总的来说，德国有义务解决其外部不平衡，并对全球增长作出贡献。尽管会有政治成本，但德国必须作出改革：结构转型、放松财政紧缩、提高公共投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口衰退的负面影响。

本文原题为“The German Problem”。本文作者 Angel Ubide 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5 年 3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印度梦”能快速实现吗？

Jim O'Neill /文 肖诗阳/编译

导读：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迅猛，并且在基建方面有所改善。基于本月初印度新一年的预算报告，作者看到其中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加强基建投资、削减企业税率等，都对印度未来经济增长颇有益处。作者指出，想要实现“印度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还需要在教育、卫生和经济政策上迈出坚实的步伐。编译如下：

本月初，在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主持下，印度正在进行 2015-2016 年的预算报告（作者当时也正在印度访问）。最近，印度经济的真实增速已经略高于中国；这与我在十多年前对金砖四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基本吻合——在这个十年的某个节点，印度的经济增速讲赶超中国并将在此后持续几十年。

这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印度的人口结构显著优于中国，而其劳动力总量及增长率与生产率是强力支持长期经济增长表现的两个核心指标。从当下到 2030 年，印度的劳动力增长将与欧洲最大的四个国家劳动力存量之和相当。尽管如此，印度的生产率却是有些“拖后腿”；倘若生产率没有进步，其人口优势或许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

在这个意义上，莫迪的预算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创举”，但只要将那些倡议落到实处，印度经济就将腾飞。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承诺对公共部门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甚至不惜提高下一年的赤字——从 GDP 的 3.6% 提升至 3.9%。此外，计划削减企业税率并提升企业外部环境等，都是有益的措施。

事实上，这些年来印度在基建方面已有所改善。比之以前，此次我从新德里到古尔冈的路程快了一个小时；而且酒店提供的汽车中还有免费 Wi-Fi。当然，现在就确定地说印度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还为时过早。但是，印度的投资气象正在改善，其未来比较乐观。到 2017 年，印度或将超越意大利和巴西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到 2020 年，印度有机会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五。然而，要想超越德国和日本，印度还需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尤其是在教育、健康和经济政策方面——改善其中学、大学的教育系统，提升其医疗卫生水平。加之稳健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这一系列的举措或许能给印度带来两位数的增长率。当然，能否实现“印度梦”还取决于印度高层的决定。

本文原题为“Realizing the Indian Dream”。本文作者 Jim O'Neill 为 Bruegel 非驻院学者 (Non Resident Scholar)。本文于 2015 年 3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去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Uri Dadush /文 李想/编译

导读：工业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维持出口和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本文认同，工业在一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也论证了不主要依赖于工业也可以实现可持续的高增长。那些最为成功的经济体都在各部门全面经历了知识积累、生产效率改善和投资增长的过程，刻意向制造业倾斜的政策应让位于促进经济体各部门前沿知识积累最大化的政策。编译如下：

过去三个世纪以来，工业都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其重要性似乎在下降。只有工业才能带来增长的长期观点基于两个关键假设：一，工业是唯一能够在世界市场持续占据份额的部门；二，工业也是能够带来可持续高生产力增长的主要部门。也就是说，经济体的其他部门都是沉闷而不可靠的，或者仅限于国内市场，因而只有在工业的拉动下可能有所发展。然而，不管这些假设是否成立，现在肯定经不起推敲。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表明，工业只是它们在世界市场站稳脚跟的途径之一。此外，除了一些必须面对面提供的服务之外，许多其他部门生产力改善的迅速程度通常都超过工业。

信息通讯技术在金融、电信、软件和商业加工外包等现代服务业中都创造了规模巨大的新增长点和许多高生产力的部门，而且使那些之前只能当面完成的服务，比如零售和银行服务等，变得可储存、分化和交易，从而极大提高了生产力。2000年以来，现代服务业出口大幅超过了制造业出口。全球化、信息通讯技术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赶超而来的一些现象为赚取外汇开拓了新渠道，刺激了自然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为资源、服务和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许多自然资源匮乏、地理位置偏远的国家在制造业上很难有竞争力，但它们可以依靠移民汇款、旅游业和相关投资带动外汇和经济增长。

1、去工业化

如表1所示，去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比重的相对下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得越来越早，相应地，服务业的重要性也更早地显现出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也在下跌，几个高收入国家的下滑速度尤其快。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收入水平较高时收入弹性很低，同时制造业的生产力比服务业更高，导致制造业相对价格下滑，但对交易量的影响不一定。然而，最近也有数据表明，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帮助下，服务业的生产力也在攀升。

表 1: 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 (增加值, %GDP)

	1990	2012*	Change
HIC Average	21.1	14.0	-33%
MIC Average	20.3	16.0	-20%
China	32.7	32.5	-1%
MIC Average excl. China	20.0	16.1	-20%
LIC Average	14.4	9.7	-33%

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也可能部分源于统计原因, 因为制造商将以前在室内完成的工作外包给服务业。然而, 正如最近 OECD 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这种影响或许很小。而且, 装配业的规模很小, 划分在制造业下的企业附加值也在下降, 这掩盖了许多服务活动, 比如市场营销, 金融和研发等。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占 GDP 比重下降的事实很难解释, 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时, 制造业的收入需求弹性较高, 而且发展中国家一般专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可能的解释有:

- 2000 年之后, 初级产品价格猛涨;
- 预期寿命增加, 健康护理需求上升;
- 教育扩张;
- 跨国旅游业发展;
- 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增加;
-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产业和生产技术。

这些技术、全球融合和政府政策上的变化, 使得穷国的转型不一定要遵循富国的轨迹。

2、出口多样化

许多人认为, 制造业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赚取外汇的能力。然而, 即使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比发达国家要快, 但它在出口中的比重依然较低。

2012 年, 以毛额基准来看, 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的 54.6%, 但以附加值的基准来看, 其比重远不及一半。而且, 过去二十年里, 服务业附加值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也在迅猛上升。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在世界银行数据可得范围内的国家中, 基于毛额来看, 只有 25 个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上显示出比较优势, 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在亚洲, 而 131 个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或服务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在出口中的份额比制造业更高（49%商品，32%制造业）。然而，除去中国，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的比重是制造业的3倍多，用附加值基准来衡量的话则高出更多。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出口增速近乎发达国家的2倍。尽管如此，在极少数发展中国家中，也有服务业出口与制造业出口等量齐观的情况，比如摩洛哥，但若依附加值的标准来看，服务业的比重还是更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占GDP比重来衡量的话，许多国家收到的移民汇款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对GDP贡献的平均值相近或者更高。例如，2013年收到移民汇款前几名的国家是：塔吉克斯坦（42%GDP）、吉尔吉斯斯坦（32%）、尼泊尔（29%）和摩尔多瓦（25%），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到的汇款占GDP比重在5-10%之间。

3、增长模式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相对较慢。在过去25年中，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非制造业增长速度是制造业增速的8-9倍。甚至在那些增长较快的国家中，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相对较小。

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研究了13个增长最快的国家——30年平均增速超过7%的国家背后的增长动力。对各国案例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是中国、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增长的明显驱动力，这些国家在增长早期都采取了进口替代和金融抑制的措施。然而，即便是这些国家，对增长贡献最高的行业也从来不是制造业。服务业几乎一直对增长贡献最高，非制造业的比重也比制造业高。

此外，制造业也并非一直是带头产业。在阿曼和博兹瓦纳，自然资源带动了增长；而在马耳他，一系列服务业、非制造产业和制造业一起引导增长，其中交通运输和旅游业最为重要。自然资源在早期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巴西也扮演了关键角色。除了巴西和中国，农业在各国高速发展早期所做的贡献相对较小。在那些起初由制造业引导增长的国家中，服务业迅速成为增长极，而且很快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比如新加坡和香港。从历史经验可以明显看到，虽然制造业在一些国家有过重要作用，但不依赖于制造业也可以有持续的高速增长。那些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有：经历过知识积累、生产力改善和各产业全面的投资。

对于那些成功完成“转型”（定义为在一代人的时期内实现人均收入翻番，具体表现为在20-30年间人均收入增速达到2.5%-3%）的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使用截至2012年数据的研究表明，39个成功转型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表现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算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也只能解释样本期间内20%的增长。同时，18个国家在服务业有比较优势，且服务业解释了近64%的增长。令人吃

惊的是，常被人忽视的非制造业（包括建筑业、公共设施等）对增长的解释力超过了制造业，而初级商品和农业的贡献只比制造业低一点。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控制贸易条件和初始收入之和以后，制造业占增加值的比重对于 2000-2012 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这一影响在发达国家并不显著。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占增加值比重每增长 1%，经济增长率将提升 0.015%。换言之，为使增长率提高 0.1%-0.2%，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要从 15% 增加到 25%，这在制造业比重逐渐下降的今天相当难实现。

4、政策启示

那些刻意优先发展制造业的政策应该让位于促进经济体各产业前沿最大化知识积累的政策，这一思路注重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移民，以及对基础设施和教育进行投资。同时，还应倡导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减轻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担忧，并允许经济政策将重点放在增长的发动机上。

本文原题为“Deindustrialisation and development”。本文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 OCP 政策中心的访问学者。本文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非完全化的军事变革：评析中国军事力量的弱点

Michael S. Chase, Jeffrey G. Engstorm 等/文 刘宁/编译

导读:中国军队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变。关注中国军力的增长是重要的,但是关注中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弱点同样重要。通过对中国军队弱点的分析,我们能够准确的了解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的。这能够为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同时也可以限制中国运用军事行动解决纠纷的能力。编译如下: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沙漠行动的胜利(1991),台海危机的产生(1995-1996),在科索沃危机中美国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1999),这一系列事件极大的促使了中国军队向现代化的转变。美国进行的上述战争已使中国意识到中国缺乏打赢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开始了 20 多年的现代化转变,不过中国军队的这种现代化转变是不完全的。中国军队还未完全建立起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中国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会被赋予怎么样的历史使命?在各类空间(陆地,海洋、空中、太空以及虚拟电子空间)作战的过程中,中国军事力量有哪些缺陷?中国在军工力量方面(军事研究与生产能力)有哪些缺陷?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可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极力的去纠正中国军队在这些方面的缺陷。中国军队虽然还未能完全的机械化和结构化,但是中国已经尝试利用信息化武装部队,并且中国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关注中国军力的增长是非常有必要的。评价中国的军事力量缺陷也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了解中国军事力量优先发展的方向,以及在未来中国军事力量可能取得的现代化成就,这样可以为美国的军事威慑提供帮助。同时防止来自中国军事力量的高压或者乱用武力。

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变得更加专业,行动更加的有力。在亚太地区,中国对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种威慑能力,防止美国的军事干涉。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的活动范围、飞行器、太空系统以及网络系统都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并且中国正在有意识的发展着这些能力。

不过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正在成为中国向现代化转变的障碍。中国军队存在不明确的党政关系,同时军队还担负着一些抗震救灾工作(这些工作原本归国务院管理,国务院也有抗震救灾领导小组这类机构),这些不明确的分工造成了一些组织架构上的矛盾。同时中国军队还面临着一系列人力资本问题和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同时大量的腐败严重的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中国军队在作战能力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军队一直试图通过整合的方式提高复杂武器和设备的运用程度,但是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同时部队的训练不

足。中国的军工企业还存在这大量的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其中包括大量的贪污、缺乏竞争意识、不计成本的开支以及缺乏质量管理进程。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中国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缺点，通过评估中国部队的发展方向，建立一种符合中国与美国军事利益的军事合作体系。同时提高美国及其盟友制止中国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能力。当对中国的威慑失败时，美国及其盟友需要进一步限制中国动用武力的能力。

本文原题为“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本文作者 Michael S. Chase, Jeffrey G. Engstorm, Tai Ming Cheung, Kristen Gunness, Scott Warren Harold, Susan Puska, Samuel K. Berkowitz 为兰德公司资深政策分析专家。[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迈向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

Ryo Hinata-Yamaguchi/文 郭楚/编译

导读：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复杂，一个构建良好的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将对东亚甚至更大范围的地区问题带来积极作用。推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存在有政治、战略和技术等几个层面因素的影响。三国政府应切实加强领导力，为促进共同利益而打造持续有效的三边伙伴关系。编译如下：

临近 2014 年年末，为应对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美国、日本和韩国签署了一项军事情报合作协议。在当前亚太安全局势下，美日韩三边合作是一种理想、符合逻辑和至关重要的关系。但是很多地区和国内的挑战仍在，因此需要为加强三边合作增势。这些挑战是众所周知的。Brad Glosserman 和 Julia Cunico 列举了三边合作的政治挑战，Sukjoon Yoon 列举了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指挥权、管理权、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等系统层面的问题。这些都要求指出一个路标来搭建三边合作机制。

阻碍这种三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尤其是日韩关系。日韩关系的困难在于缺少互相尊重的持续行动，对对方的处境和情感缺乏互相理解，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这些问题还由于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缺少沟通和误解而被扩大化。日本领导人的修正主义史观和韩国对日本在此问题立场的不满是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而媒体和极端民族主义宣传则夸大了这些因素，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日韩关系其他的主要政治问题是缺少强调对双边共同利益的保护。日本和韩国之间不仅有共同的战略、政治经济利益，还有促进在贸易、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与繁荣的共同利益。鉴于此，任何政治安全的威胁都将影响彼此利益。因此，两国政府都要提高认识：任何不能对这些双边共同利益的保护都将是两国关系的一种失败，并将危害两国的安全。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最后一个失败，是还没有就构造一个战略合作框架提出概念，这个框架将为三边合作、和解和打造一个有效可持续的机制提供动力。为达此目的，三国政府必须首先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合作？

在定义合作的战略目的时，应认识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是在一定条件下和有边界的，这一点十分重要。比如说，专门用来遏制中国和朝鲜的这种合作关系是没有根据的。毕竟，虽然美日韩三国对中国和朝鲜有疑虑，但这两个国家对他们有不同的利益，打交道的方式也不一样。再者，中国和朝鲜也将利用这种伙伴关系进行反制。因此，以应对外部威胁的路径打造三边合作缺乏战略动力和持久性。更好地选择是，打造一种能力建设的合作机制，利用现有的条件和专门的技术弥补三边关系中的薄弱环节。美日韩应从情报、监察、侦察（ISR），人道主义自

然灾害救援(HA/DR)，网络问题、运输安全、补给等问题入手，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包括导弹防御领域。一种基于能力建设的伙伴关系将为三国在设置特定议程、开展行动、推进行动时提供便利，同时减轻国内负担。能力建设合作在战略指向上是模糊的，并不先验地认定威胁的来源。然而，在增强了薄弱环节领域的能力打造后，就可以对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进行反制。这种美日韩三边关系进而也将对东亚以外的全球安全做出贡献。

美日韩三边合作需要一些前提条件。

第一，必须规划三边伙伴关系的战略远景。日本必须明确地支持韩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安全利益，韩国也应该理解日本对地区稳定问题的关切。美国的强有力领导是必须的，不仅在维持三边伙伴关系上，同时也在地区安全保证和战略存在问题上。

第二，推进一个三边合作的战略行动框架将涉及政治和官僚资本的重大投入的再调整。鉴于目前三国政府中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推进这种投入调整并不容易。必须以一贯的坚定和耐心使这些问题不受国内政治的绑架，同时也能有效推动调整和转变。

第三，美日韩必须就三边合作达成战略和法律声明。日本转向独立集体安全防御的行为意味着日本将在未来的应对所谓“灰色地带”危机中发挥行动力，同时也能在伙伴国周边发挥战略支持作用（当然是在该国的授权下）。同样地，韩国日益增强的防务能力也意味着它能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三国政府必须定义这些具体计划和执行规则，以便使他们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立即行动起来。

第四，政治敏感性和合作透明度必须很好地平衡。尽管透露三边合作谈判的具体内容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关于合作指导方针的定期通告是必要的，这将促进日本和韩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此外，展示日韩两国政府的持续承诺将有助于说服公众认识到三边合作的必要性。

关于合作的运行机制，打造能力建设路径的关键是可靠的三边协调和运作一体化。政治和能力方面的协调需要专业的技术、协同能力和畅通无阻的沟通渠道。为达此，不仅需要官僚职能部门的再调整，同时需要增加双边联络人相互派遣的频率、提高联合演习和训练的人员素质。更进一步地，美日韩应当组建一个协调三国不同指挥体系的核心委员会机制。

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将能调动更多的资源促进地区安全。合作能否发挥作用将取决于领导力，不仅在加强沟通和处理政治问题上，也在努力搭建合作框架与建立必须的政治和官僚职能机制上。无论如何，历史问题都不应当影响合作。共

同利益保护、审慎的战略和行动规划框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都将是迈向有效和长久的伙伴关系的第一步。

本文原题为“Steps toward a US-Japan-ROK trilateral partnership”。本文作者为美国智库 CSIS 学者 Ryo Hinata-Yamaguchi。本文刊于 2015 年 2 月 2 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亚投行之祸：华盛顿该如何应对

Elizabeth C. Economy /文 高歌/编译

导读：英国宣布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美国面临着受到盟友背叛的尴尬局面，作者在文章中就美国应对亚投行的措施提出了三种方案，并分别进行了利弊分析，认为美国加入亚投行或不再干预盟友加入亚投行才是明智的选择。编译如下：

英国在上周宣布了将要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给了美国从一开始就对亚投行产生的错误认识和采取的错误策略迎头一击。亚投行给美国带来的忧虑越来越明显：亚投行会与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展机构产生竞争，在亚投行内部有出现薄弱的环保标准和社会保障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可能利用亚投行投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在区域内的筹码。

奥巴马政府也曾花费极大精力试图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然而在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澳大利亚和韩国显然也在重新考虑是否加入，并且很可能拿英国的率先加入当做政治上的掩护，美国所小心维护的联合将要逐渐瓦解。

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有三个选择：

第一，在亚投行的治理流程完全确定下来之前，继续向盟友施压，阻止他们加入。

第二，自己也加入亚投行。

第三，放弃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无谓努力。

选择一显然是亏本生意。继续将政治资金花费在试图说服区域内或区域外的行为体不要加入亚投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美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如果在这种小问题上过分计较反倒会露怯。

选择二，美国加入亚投行。这样做能够让美国在这一机制中有一席之地，如果亚投行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治理实践，美国也能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不能，美国则可以成为其内部的批判力量。同时，加入亚投行也能够保证美国企业在亚投行的投资融资中拥有公平的竞争机会。即便是短期内看起来有损颜面，加入亚投行在实质上能够使美国公开地认清亚投行所能提供给亚洲地区融资能力，并能够快速转向同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合作制定出相同的准入规则。

选择三，不再干预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或者试图对其施加压力，任凭亚投行自生自灭。从中国主导的一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在赞比亚、缅甸、越南等国都出现了严重困难的情况来看，如果亚投行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的话，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加入了亚投行的国家来说都会是一个污点；但如果亚投行能够达到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标准，那么它会成为对开发性金融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况且美国其实并没有必要加入每一个亚太区域组织。

如今华盛顿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再平衡来推进美国的理念和机制，而不是不分时机地打击中国的积极性。亚投行对美国来说是心中的一块大石，无论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把它放下。

本文原题为“The AIIB Debacle: What Washington Should Do Now”。本文刊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的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官网，作者 Elizabeth C. Economy 是 CFR 高级研究员和亚洲研究主管，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国内国外政策，中美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等。[单击此处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RAND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8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3名。

网址：<http://www.rand.org/>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 美国企业研究所

简介：AEI成立于1943年，是一家私人的、非党派、非盈利机构，从事政府、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研究和教育。AEI的目的是通过从事与当前最重要之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为领导人和公众服务。AEI下设七个研究部门：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政治与公共舆论、教育、健康、能源与环境以及社会与文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AEI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7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9名。

网址：www.aei.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 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 伯克和大使大卫 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 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SIS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5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1 名。

网址：<http://csis.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 1977 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 1921 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 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 20 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 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 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4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6 名。

网址：<http://www.cfr.org/>